

非阿拉伯因素的影响

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分析*

金良祥

摘要：伊朗宗教地缘战略是指伊朗积极利用宗教纽带构建以伊朗为中心、涵盖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其他什叶派居住地区的势力范围的战略谋划。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建立在宗教认同的基础之上，而非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上，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安，但具有防御性和理性特点。鲁哈尼时期，伊朗将会对其宗教地缘战略有所克制，但不会放弃。

关键词：伊朗宗教地缘战略；宗教认同；什叶派

作者简介：金良祥，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23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0-0088-11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属2009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2009JG501-BGJ940）的阶段性成果。

进入21世纪以后，中东地区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伊朗积极利用宗教纽带构建以自己为中心、涵盖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其他什叶派居住地区的什叶派势力范围。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已经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教派关系的重要因素，未来仍将是左右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内在变量。本文尝试分析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的内涵和特点，并对其影响作出评价。

一、伊朗宗教地缘战略的内涵

伊朗宗教地缘战略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也是伊朗政治和宗教精英对宗教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主观反映。其内涵主要包括：

（一）以宗教认同为纽带。

在全球化时代，宗教并没有因为席卷全球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潮流实质性地淡出人类社会，而是仍然“决定着人类群体的边界”。对历史、神学以及宗教法律的不同解读如同语言和种族一样发挥着界定身份的作用。

尽管因为冷战等国际和地区内原因，逊尼和什叶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一度被掩盖而处于次要地位，但从未真正消失，宗教认同更没有淡化。不仅黎巴嫩的什叶派将伊朗视为追随的目标，而且伊拉克的什叶派亦将伊朗视为安全港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受到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残酷迫害，一些什叶派宗教精英和民众纷纷逃往伊朗寻求避难。什叶派宗教仍然作为唤起认同的因素而成为什叶派力量赖以团结的精神纽带。当然，宗教纽带的存在既是基于历史的必然，也是伊朗主动建构的结果。伊朗外交中所奉行的伊斯兰立场，如反对西方宗教亵渎、维护伊斯兰尊严的外交等，特别是为遭受迫害的什叶派提供庇护的行为，均发挥了维系宗教纽带的作用。

（二）以维护国家和地区什叶派利益为目标。

对于伊朗而言，宗教和国家是相互结合的整体。一方面，伊朗是什叶派信众最多的国家，作为民族国家，不仅为什叶派宗教在当今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中提供了国家载体，而且为维护什叶派宗教意识形态的安全、维持信众的规模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什叶派宗教为伊朗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什叶派中东为伊朗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依托。

宗教地缘战略是伊朗总体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具有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目标，也具有维护什叶派宗教利益的使命。伊朗为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伊拉克什叶派政府所提供的支持，以及为海湾逊尼派国家什叶派反政府力量提供的政治和精神支持，固然是出于维护其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包括反美、抗衡逊尼派海湾国家以及成为地区大国的雄心等，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什叶派的宗教认同，以及保护什叶派意识形态、信众规模和安全的客观需要。什叶派宗教为伊朗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以及精神纽带。可以说，没有什叶派伊斯兰，也就没有伊朗民族国家。

（三）以确保什叶派地缘政治板块的完整性为途径。

什叶派之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拉克战争的副产品，而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势力范围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伊朗以及什叶派力量主动经营和建构的结果。确保伊拉克的亲伊朗立场是伊朗宗教地缘战略的至关重要的环节。伊拉克总人口约为2300万，其中什叶派占人口总数的60%左右，是仅次于伊朗

Vali Nasr, *The Shia Revival*,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6, p.23.

吴冰冰：《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25 ~ 332 页。

的第二大什叶派国家。伊拉克的外交取向在教派层次上关乎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力量对比，在国家层次上关乎伊朗与地区对手的力量平衡。由于在地理上处于什叶派之弧的核心地带，伊拉克外交上亲伊朗还是亲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直接关乎什叶派地缘板块的完整性。美国国务卿克里 2013 年 4 月访问伊拉克时要求伊拉克加强对伊朗过境伊拉克飞往叙利亚的航班的检查，从侧面表明伊拉克在各什叶派力量之间所发挥的重要枢纽作用。

共同的宗教渊源、经历，特别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伊朗为遭受萨达姆政权迫害的什叶派宗教精英和民众提供庇护的历史，为伊拉克亲伊朗的外交提供了认同基础。同时，伊拉克外交的什叶派倾向也是伊朗积极主动争取的结果。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朗的高层，包括总统、议长和外交部长等均访问过伊拉克，并多次接待伊拉克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经济上，伊朗通过贸易、投资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援助等方式广泛参与伊拉克重建。而伊朗与伊拉克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堪称地区典范”。

伊朗对伊拉克的外交达到了其预期目的。2012 年之前，由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掌控的阿拉伯联盟一直拒绝将阿盟峰会的举办权授予伊拉克，实则反映了它们对伊拉克外交取向的强烈不满。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反对伊拉克举办峰会的公开理由是伊拉克不具备举办此类峰会的安全条件，但其根本原因则是伊拉克所推行的亲伊朗的政策。伊拉克的阿盟峰会举办权之争从侧面反映了伊拉克的亲伊朗立场。

伊拉克与土耳其和约旦同为叙利亚的重要邻国，同样面临叙利亚危机所导致的难民问题，但却实施了与土约完全不同的政策。如同黎巴嫩，伊拉克也是少数在叙利亚问题上追随伊朗、反对颠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中东国家之一。2011 年 11 月，阿盟峰会暂停了叙利亚的成员资格，伊拉克是少数投弃权票的国家之一；2013 年 3 月，伊拉克也是反对阿盟峰会授予叙利亚反对派成员席位的少数阿拉伯国家之一。

防止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崩溃则是伊朗宗教地缘战略的第二个重要环节。来自什叶派分支之一阿拉维派的巴沙尔·阿萨德并未区别对待国内不同的宗教派别，而是更多地依靠阿拉伯复兴党的组织及其意识形态治理国家。尽管如此，由于巴沙尔延续了其父亲反以、反美立场，并奉行与伊朗结盟的政策，在教派矛盾日趋激化的背景下，巴沙尔领导的叙利亚被视为什叶派阵营的重要成员。否则，非但伊朗和伊拉克，就连黎巴嫩真主党也不会将巴沙尔政权视为唇齿相

Anoushiravan Ehteshami and Mahjoob Zweiri ed., *Iran's Foreign Policy from Khatami to Ahmadinejad*, Ithaca Press 2008, P.45.

“Iran, Iraq call for expansion of defense ties”, *Tehran Times*, October 3, 2012.

依的伙伴。

如同确保伊拉克亲伊朗的外交倾向，维护巴沙尔政权的安全对于伊朗实现其宗教地缘战略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阿萨德政权能够坚守，那么伊拉克战争之后什叶派力量连接成片的格局将继续维持，伊朗依旧具备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甚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抗衡的资本；相反，如果叙利亚因为政权更迭而成为一个逊尼派掌权的国家，那么伊拉克战争之后什叶派力量连接成片的格局将不复存在，什叶派将不得不重归守势，伊朗甚至面临生存危机。一个有着 7500 万人口且胸怀地缘政治抱负的伊朗绝不会坐视巴沙尔政权陷入危局而不顾。政治上，伊朗与西方和逊尼派国家针锋相对举办以维护巴沙尔政权为目标的叙利亚全国和解大会；支持巴沙尔政府 2013 年 1 月 6 日提出的召开全国和解大会以及建立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以监督选举、制订宪法、举行大赦等；力图说服土耳其等有影响的国家接受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

伊朗亦利用“伊斯兰觉醒运动”将教派冲突推进到海湾国家的内部。美国等西方国家将 2011 年初发生在阿拉伯国家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运动称作“阿拉伯之春”，而伊朗则将其视为 30 多年前伊斯兰革命的历史延续，并冠之以“伊斯兰觉醒运动”。这场运动的政治后果虽首先在于打破了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统治秩序，但也为地区秩序的重塑提供了条件，也为伊朗以宗教的方式引导地区秩序发展创造了空间。

除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以外，包括沙特、巴林以及也门在内的海湾国家的部分地区也是什叶派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自 2011 年初以来，上述国家的什叶派穆斯林受席卷地区的“伊斯兰觉醒运动”的影响亦相继掀起了规模不等的反政府运动，至今仍然没有消停。逊尼派海湾国家国内的什叶派反政府运动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强劲的韧性，固然可能首先在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同时也是由于伊朗的“煽风点火”。尽管伊朗一直否认其干涉逊尼派海湾国家内政的意图和行为，是不是有能力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也的确值得怀疑，但类似于“巴林需要为其因未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反政府运动问题而造成的地区局势动荡承担责任”偏袒反政府力量的言论无疑无助于海湾国家内部矛盾的缓和。

如果说伊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问题上的宗教地缘战略只是维护和防御其自伊拉克战争以后所获得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话，那么伊朗为什叶派反政府力量所提供的支持，事实上又将两大教派之间的对峙推进到逊尼派海湾国家的内部。

“Iran advises Bahrain to meet public demands instead of leveling allegations”, *Tehran Times*, October 16, 2012.

二、伊朗宗教地缘战略的特点

在新的国内、国际条件下,宗教影响伊朗外交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则是其体现之一。与“输出革命”相比,其宗教地缘战略表现出了新的特点。

(一) 该战略乃是对地区形势变化的防御性而非进攻性反应。

伊朗在革命初期所奉行的激进外交政策、近年来鼓励海湾国家反政府运动的行为以及内贾德前任总统类似于“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言论,均加剧了西方和海湾国家的不安。即使如此,伊朗的外交也不应作进攻性解读,而是“应该被视为伊朗确保其地缘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措施的一部分”。伊朗事实上是以一种进攻的姿态实现其战略上的防御性目标。

进入 21 世纪以后,由于伊拉克战争,什叶派力量最终连接为整体,地缘环境极大改善。但什叶派人口总数仍然仅为 1.2~1.3 亿,相当于全球穆斯林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相对于逊尼派的强势地位而言,什叶派处于弱势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伊朗以及什叶派力量并不具备采取进攻性姿态的能力和条件,而仍然处于弱势和防守地位,伊朗的一些煽动性的和激进外交言辞实则是掩盖其战略上的弱势地位和不安全感。经验表明,“伊朗越是感到威胁,越有可能扩大其地区影响 (presence)”。

21 世纪以后伊朗和什叶派的地缘环境的改善并非由于其主动谋划,而是美国以反恐、反扩散为名发动的两场战争的结果;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固然有主动建构的成分,但更多的则是维护其在两场反恐战争的既得利益;伊拉克外交的什叶派倾向,既源于其什叶派宗教认同,也源于伊朗的积极争取,但伊朗的外交乃是巩固和维护其意外获得的地缘战略收益。

叙利亚危机的爆发固然在于其国内矛盾的激化,但也是因为西方和海湾国家大力鼓励和支持叙反政府力量。伊朗之所以支持巴沙尔政权,原因在于维护其自身的政权和国家安全以及什叶派的利益。如果巴沙尔政权崩溃,伊朗不仅失去了战略纵深,而且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干涉的目标。可见,伊朗的外交本

Kayhan Barzegar, “Ir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after Sadda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January 2010, p.174.

Ray Takeyh, “Iran’s Place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Historical Overview”, *Engaging Iran and Building Peace in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A Report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62*,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Washington, Paris, Tokyo, 2008, p.3; Volker Perthes, “Ambition and Fear: Iran’s Foreign Policy and Nuclear Programme”, *Survival*, June-July 2010, pp.95-113.

Kayhan Barzegar, “Ir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after Sadda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January 2010, p.182.

质上是防御性的。

伊朗为海湾国家国内什叶派反政府力量所提供的支持，无助于这些国家的局势回归稳定。虽具有破坏性，但对于伊朗而言，仍然只是防御性战略的一部分，伊朗试图通过外交牵制逊尼派海湾国家的对外行动能力。换言之，伊朗试图通过进攻性姿态达到防御性目的，是将防御阵线推进到对手的国内。

（二）该战略是对地区形势的理性而非过激反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初期，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声电台号召海湾地区和全世界的穆斯林起来反对本国政府。为达到目标，伊朗在国内成立了伞状组织结构为各国伊斯兰势力的反政府运动提供组织和意识形态指导，与官方保持暧昧关系的一些伊斯兰组织甚至在多个伊斯兰国家实施了针对政府领导人的暴力袭击。不仅伊朗的外交目标远远超过了其现实的国力，而且对外行为因为严重脱离实际而表现出盲目性甚至是狂热性。

进入 21 世纪以后，伊朗的民众仍然成批前往阿里陵墓所在的纳杰夫和第三代伊玛目侯赛因被害的地点卡尔巴拉朝觐，宗教领袖和政治精英仍然在重大宗教节日里前往第八代伊玛目葬身之地马什哈德，宗教依然是左右伊朗政治和外交的重要因素。然而，相对于伊斯兰革命时期的盲目性、激进性以及狂热性而言，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基于理性和冷静的思考。

尽管西方国家对伊朗的伊拉克政策不乏批评之辞，主要表现为对伊朗可能给予伊拉克激进反美组织以军事支持不满，亦对伊朗竭力争取伊拉克的政策感到不安，但客观而言，伊朗对伊拉克的政策并没有违反通行的国际规范，也没有追求高于其实际能力的目标。伊朗接受了伊拉克什叶派伊斯兰势力以政党的形式参与政治、进行国家治理，并予以积极支持。当然，伊朗也没有理由像西方国家指责的那样试图从伊拉克动荡中获利。

伊朗的伊拉克外交政策的目标，也仅限于维护伊朗以及地区什叶派的宗教利益，一是帮助建立与伊朗保持友好甚至是结盟关系的政府，以保持什叶派宗教地缘板块的完整性，二是防止伊拉克成为美国或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的跳板。

其中，后者尤其表现在伊朗对美国与伊拉克 2009 年签署“驻军地位协议”（SOFA）的担忧上。伊朗非常担心“协议将使美国在伊朗政治安全后院的角角色机制化”。

[美]J.L.埃斯波西托著：《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9 页。

Babak Rahimi, “Iran’s Declining Influence in Iraq”,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12, p.29.

Kayhan Barzegar, “Ir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after Sadda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January 2010, p.176.

即使是在始于 2011 年的新一轮“伊斯兰觉醒运动”爆发后，伊朗也没有放纵其国内要求输出革命的政治冲动。为加强对“伊斯兰觉醒运动”的引导，伊朗于 2011 年专门成立了由伊朗资深外交官、前外交部长和最高领袖的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领导的“伊斯兰觉醒会议”，但除此之外，伊朗并没有采取更为激进的行为。伊朗未煽动沙特、也门和巴林等国的什叶派伊斯兰势力起来推翻政府，而是呼吁上述国家通过政治对话的方式保障什叶派穆斯林的权利。伊朗为反政府力量所提供的支持也仅限于政治和道义范畴，而不是思想和意识形态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伊朗对于不同的中东国家发生的“伊斯兰觉醒运动”的立场也不相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基于务实主义的双重标准并无差异。同样是“阿拉伯之春”，美国为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的反政府运动提供支持，但默认了巴林政府联合海湾国家镇压巴林反政府运动。伊朗则在叙利亚问题上站在巴沙尔政府一边，但强烈谴责巴林镇压反政府运动。美伊虽在具体问题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但都是基于务实主义的考虑。

简言之，伊朗的外交已经于 20 世纪九十年代走上了务实主义的轨道，而伊朗宗教地缘战略的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宗教影响伊朗外交的内涵和方式已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于宗教的社会和政治功能的根本性转变，宗教不再作为意识形态左右伊朗外交走向，而是作为界定身份的因素为伊朗构建什叶派势力范围提供精神纽带。

三、伊朗宗教地缘战略的地区影响

伊朗宗教地缘战略的产生在很大程度需要归因于过去十年来中东地区的风云变幻。同时，伊朗积极构建什叶派势力范围的战略亦将深刻影响中东地缘战略格局和政治安全形势。

（一）该战略促进了中东多极化趋势。

以成功领导海湾战争以及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为标志，美国一度获得了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垄断性影响力。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后，美国不仅未能成功掌控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的发展，也未能在中东和平进程和伊核等重大地区热点问题上举得实质性进展。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既以反美为主要动力，也以反美为主要目标，与美国自身实力相对下降以及小布什政府所发动的两场“导致对美国全球地位的灾难性伤害”的战争，构成了 21 世纪初期美国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陈东晓等译：《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6 页。

主导地区事务能力急剧下降的重要原因,并进而有利于地区多极化趋势的出现。

美国的影响力下降,不仅为中东地区性大国,而且为全球性大国在地区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空间。无论就人口数量、领土面积,还是就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而言,埃及、土耳其和伊朗都是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其中埃、土、伊三国各自人口总数均超过七千万。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则更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而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上述四个地区力量不仅未能在地区事务上发挥与其实力相应的作用,甚至也未能形成有意义的互动。美国影响的下降将为上述四支力量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机会。近年来,上述四大力量已经围绕地区事务展开了紧张互动。2012年末,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发动“防务之柱”行动之后,四者均竞相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力图掌控关于巴以问题的话语权。从2012年开始,埃及提议成立由埃、沙、土、伊组成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四国外长机制,虽因沙特持观望态度,机制前景并不乐观,但围绕该问题的互动已经形成。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亦将有利于其他全球性大国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作用。随着伊拉克萨达姆和利比亚卡扎菲两个反美政权的垮台,原本松散的反美阵营逐渐崩溃,国家层次上的反美主义逐渐式微。然而,即便如此,中东地区并未出现美国一统天下的局面。伊朗虽然成为反美阵营的唯一国家,但积极利用伊拉克战争提供的机遇,在什叶派地区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使得中东反美主义表现出强烈的什叶派色彩,并极大地牵制了美国在中东的行动能力。由于伊朗的积极争取,伊拉克在战后并未实施完全亲美的政策,而是在美国与伊朗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这种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的政策事实上有利于其他大国在伊拉克发挥更大作用。叙利亚国内反政府运动已经持续两年有余,且得到了美国和海湾国家的支持,但巴沙尔政权并没有崩溃,而是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伊朗的支持。伊朗与地区外大国的“反干涉力量”一起成为牵制美欧武力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重要因素。

当然,宗教地缘战略也是维护和巩固其地区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伊朗是中东地区的大国,且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宗教文化底蕴深厚,具备成为地区一极的地理和物质条件。通过地区什叶派力量的整合,伊朗进一步改善了自己的地缘政治条件,获得了重要的战略依托,具备了成为地区一极的坚实基础,并成为地区多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该战略对中东政治安全形势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Iran, Turkey, Egypt, S. Arabia will resume talks on Syria: official”, *Tehran Times*, April 22, 2013.

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以维护伊朗的国家利益和什叶派的利益为目标，虽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却对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进入 21 世纪后，中东地区仍然动荡不安，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之一便是地区内和地区外大国对部分国家内政的干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东国家大多并未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尤其脆弱，一旦遭遇外部干预，极容易崩溃，不仅造成国内混乱，而且波及地区。同时，外部干预也剥夺了地区国家自己决定本国事务的权利。

伊朗宗教地缘战略的积极意义在于其具有反干涉内政的一面。伊朗为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提供的支持，固然有其维护什叶派宗教地缘板块完整性，从而服务于其地区战略目标，同时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反对美欧和逊尼派海湾国家干涉叙利亚内政的作用。伊朗所提供的支持与国际社会反干涉力量共同为巴沙尔政权维持其生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叙利亚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创造了条件，并为防止叙利亚出现类似于卡扎菲政权崩溃后产生的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本身也具有干涉他国内政的一面，故而对地区安全形势也具有破坏性影响。伊朗为伊拉克现政权所提供的各种支持虽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克服政权重建初期的困难，但伊朗对伊拉克政府所施加的影响在客观上也因其助长了伊拉克政权的什叶派倾向，而弱化了其建构包容性更强的伊拉克民族国家的动力，并不利于伊拉克国内各个教派之间的和解。同样，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从而“机制化了其在黎巴嫩的政治影响”，增加了黎巴嫩民族国家建构的难度。更有甚者，“伊斯兰觉醒运动”爆发之后，伊朗竭力为逊尼派海湾国家国内什叶派反政府力量提供支持，也助长了上述国家反政府运动，不利于这些国家的教派和解和国家稳定。

四、鲁哈尼时期伊朗宗教地缘战略展望

伊朗的宗教地缘战略更是其宗教和政治精英的主观反应，一旦形成，将表现出稳定性，其宗教基础更将使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伊朗一直决心成为在地区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领导者，必然将继续加强和巩固已经形成的宗教地缘战略，并使什叶派中东成为维护国家利益、推进其反美和抗衡逊尼派力量的战略依托。当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伊朗推进其宗教地缘战略的手段、方式和力度将有所不同。

Kayhan Barzegar, "Ir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after Sadda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January 2010, p.182.

2013年8月，在经历8年改革派、8年的保守派执政之后，伊朗迎来了务实保守派执政的时期。执政5个月以来，鲁哈尼政府以“微笑外交”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以积极的姿态参加伊核会谈，力图扭转其前任造成的外交被动局面，并进而改善经济。这一新的动态必然将对其宗教地缘战略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鲁哈尼可能会适当调整其前任的政策，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方面，为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鲁哈尼有可能放弃其前任过于激进的支持周边国家什叶派反政府力量的政策，进而缓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在伊朗与有关六方达成伊核问题第一阶段协议后不久，即2013年12月初，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旋即访问了部分海湾国家，包括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并表达访问沙特的希望。在其急于缓和与海湾周边国家关系的背景下，伊朗将不得不降低对沙特和巴林等逊尼派国家什叶派反政府力量的支持力度，以尽量减少反感。另一方面，鲁哈尼仍将会维持和发展其宗教地缘战略。伊朗将会继续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力量，以确保伊拉克的亲伊朗倾向；伊朗也不会放弃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并将继续以此来达到影响黎巴嫩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目标。鲁哈尼政府也不会改变其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政策。不仅如此，鉴于巴沙尔政权对于伊朗地缘政治的特殊重要性，防止叙利亚政权更迭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伊朗宗教地缘战略中最重要的任务。

鲁哈尼的温和风格无疑为伊朗外交带来了明显改观，但并没有改变伊朗的外交战略目标。换言之，鲁哈尼政府是以另一种国际和地区国家更能接受的方式推行其外交战略。反美、抗衡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以及争取地区大国地位，不仅仍是伊朗外交的重要战略目标，也是伊朗宗教地缘战略的主要动力来源。特别是反美，虽未必是鲁哈尼政府的本意，但在伊朗国内仍有相当民意基础，即使鲁哈尼本人也断然难以根本扭转。

2013年11月24日，伊核问题有关各方在经过数日紧张谈判之后终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意味着伊核问题出现了积极进展。然而，第一阶段协议并未在伊朗究竟能够拥有何种水平的浓缩铀能力和取消制裁这两大核心问题上取得进展，故而并不能被视为“历史性突破”。协议虽然不要求伊朗冻结纯度为5%的浓缩铀的生产能力，但并没有满足伊朗关于明确承认其“和平铀浓缩权利”的要求。协议虽取消了部分制裁，包括取消对伊朗部分海外资产的冻结，数额约为70亿美元，以及对伊朗飞行器零部件和贵重金属物进口的制裁，但并没有松动对伊朗石油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制裁。后者才是伊朗在核问题上的核心关

“Iran urges Arab help to end Syria tragedy”, *Tehran Times*, December 4, 2013.

关于第一阶段伊核协议，可参见“The Deal is Done”, *Tehran Times*, November 25, 2013.

切。美国对伊朗的石油贸易的单边制裁导致伊朗石油出口从 250 万桶每日下降到 100 万桶每日；美国对伊朗金融体系的制裁则使得伊朗的对外贸易几乎处于崩溃状态。不仅如此，第一阶段协议所带来的乐观也未必预示着伊核进展能够必然持续。美国方面能不能取消其对伊朗石油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单边制裁仍将是伊核问题面临的难点。美国国内特别是美国国会内部，仍然存在强大的反对与伊朗改善关系的势力，仍将是取消制裁伊朗的强大阻力。即使是在第一阶段协议已经达成的背景下，美国行政系统仍然违背协议扩大了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国会亦在推动新的制裁。而如果美国不能实质性地取消制裁，伊朗方面能够将其妥协进行到底吗？

总之，鲁哈尼的“微笑外交”以及第一阶段协议，虽然暂时缓和了伊美关系紧张对抗的局面，但尚未改变伊美对抗关系的本质。在伊核问题尚未根本性突破的情况下，反美仍将是伊朗国内重要的政治思潮，它将与抗衡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以及争取地区大国地位的战略需要一起成为伊朗宗教地缘战略的动力。

An Analysis on Iran's Religious Geo-strategy

JIN Liangxiang

(Ph.D, Research Fellow of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bstract Iran's Religious geo-strategy refers to its efforts to construct its sphere of influence based on Shiite religious bonds covering Iraq, Syria, Lebanon and other Middle East areas resided by Shiite muslims with itself at the center. Iran's religious geo-strategy is crafted upon religious identity instead of revolutionary ideology. Though it aroused concer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is by nature defensive and rational. In Rouhani's era, Iran might restrict some of its expansive behaviors, but will not give it up.

Key Words Iran's Religious Geo-strategy; Religious Identity; Shiite Islam

(责任编辑：李 意)